

小孩子都爱听父母教他们几首童谣,给他们讲童话故事。俄罗斯民族诗人普希金(1799—1837)也是这样。他小时候,奶娘阿琳娜·罗吉昂诺夫娜教给他几首童谣,给他讲俄罗斯民间故事。普希金一生都对她的奶娘充满了依恋的深情。

阿琳娜·罗吉昂诺夫娜(1758—1828)出身农奴,不识字,为人勤劳善良,头脑聪明,记性特别好,深受主人信任。普希金和他的姐姐、弟弟,小时候都由这位奶娘守护照料。

普希金出身贵族,家里有外籍教师,他从小说法语跟说俄语一样流利。他父亲爱好文学,家里藏书很多,普希金从小就喜欢读书,7岁开始写诗,很早就显示出非凡的文学才能。

11岁时普希金离开父母,在皇村中学读书,其间有欢乐也有烦恼。1814年,14岁的少年诗人写了一首诗,题为《我的肖像》,其中有这样的诗行:

打在课堂里面上课,  
小小年纪我就很顽皮;  
人不笨,说话不胆怯,  
不扭捏也不故作谦虚。

我爱看芭蕾也爱看戏,  
假如能更加坦率地说,  
倘若我不在皇村学习,  
我的爱好肯定会更多……

向来淘气的一个顽童,  
相貌与猴子有些相像,  
过于轻浮,不知稳重,  
普希金就是这般模样。

如果你见过普希金的画像,就会发现他头发卷曲,皮肤微黑,眼睛明亮,嘴唇很厚,原来他外曾祖父是彼得大帝时的黑奴尼拔,也就是说,普希金身上有黑人血统,他那机敏、活泼、爱冲动的性格,跟外曾祖父也很相似。在皇村学校读书

不知何故,自古以来,草桥这种交通设施极易受到文人墨客青睐,被人入诗、入画,或当作小说、戏剧的背景地。“草桥夜醉月明下,桃关吟吟春色中”“草桥跨涧水潺潺,不厌羊裘把钓纶”等诗句至今仍广为传诵。京剧《草桥关》、越剧《草桥拜桥》等剧目也久演不衰。

而草桥本身,如今反倒成了人们听起来耳熟,但却难解其详的名词。尽管在一些地方仍有“草桥”“草桥镇”等古老地名,但那里大都已经不见草桥的踪影,仅留下一通记录草桥掌故的石碑,甚至一段传说而已。由于“草”字有“非正式的、山野的、民间的”等

## 孙犁先生笔下的草桥

刘植才

含义,因而从字义上推断,草桥似应是一种简易桥梁,而不大可能是用草结成的桥。有些草桥也可能是民间建造的。但在现实生活中已经难觅其“庐山真貌”。

求助于专业书籍,洋洋百万言的学术专著《中国建筑论》中并没有关于“草桥”的内容。查阅手头的工具书,也没找到“草桥”这个词。在《辞源》中倒有“草桥”词条,言其故址在河北高阳县东,相传因宋杨延朗建草桥于此而得名。另据《清一统志》记载,草桥关在高阳县西二十里,建于北周显德六年。二者对草桥关具体方位的记载虽有出入,但都在高阳县境内。这使我想起孙犁先生的长篇小说《风云初记》中,有一段“红色恋人”草桥相会的故事也发生在高阳附近。

我的家乡在河北省中部,白洋淀东岸。每当阅读孙犁先生那些以冀中平原为背景地的文学作品时,我总是感到格外亲切。作品中的文字仿佛会化为冀中乡音,“刻录”在我的脑子里。因此,在读过多年之后,我依然记得《风云初记》中“草桥相会”的场面。

那是1938年仲春时节,抗战风云初起的冀中平原上,刚满18岁的女共产党员春儿结束了在边区民运学校的学习奔赴工作

天津是华北、西北地区皮毛的集散地和出口地,得此之便,天津的近代制革业起步较早,发展也较快。1898年吴鼎鼎在天津设立北洋硝皮厂,这是我国第一家采用现代鞣革技术和机器设备的近代制革厂。经过民国前期的快速发展,到1936年天津已经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制革中心,其中规模最大的华资制革厂当数华北硝皮厂。

华北硝皮厂诞生于1915年4月,是天津设立的第二家新式制革厂,厂址位于河北区金家窑大街(后迁至三条石东口)。创办人王晋生(又名王健)早年留学美国,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硕士,回国后邀请天津青年会干事陈锡三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集资创立了华北硝皮厂,王晋生担任经理兼工程师。华北硝皮厂资本金最初只有5000元,1917年投产运营,随着30年代前后我国制革业的快速发展,华北制革厂也迅速扩大规模,1929年资本金增至20万元,1937年前年营业额最高为60万元,工人有90多人,职员10余人,可与中日合办(实为日本独资)的裕津硝皮厂抗衡。

当时,制革业正处于日式制革向美式制革的转变过程中,新旧制法在去脂、去毛、使用的各种原料、辅料等方面均有很大不同。华北制革厂采用新式的植物

## 普希金童话的启蒙者

谷羽



图画书中描绘的奶娘为普希金讲故事的场景



普希金和奶娘阿琳娜纪念碑雕像

期间,他的外号就叫“猴子”,对于同学们开玩笑的称呼,他倒是欣然接受,毫不介意,并且写进了自己的诗篇当中。

1817年皇村学校毕业后,普希金进入外交部担任译员,不久因为创作《自由颂》《乡村》等充满叛逆精神的诗篇,引起沙皇震怒,因而遭受惩罚,刚刚20岁就被流放到俄国南方,受上司监视管教,不得自由行动;24岁时,又因得罪南方总督沃隆佐夫,被解除公职再度流放,囚禁在北方普斯科夫省偏远的庄园米哈伊洛斯克,受地方官员和教会的双重监督。

在北方两年多孤独寂寞的生活中,陪伴诗人的是他的奶娘阿琳娜·罗吉昂诺夫娜。在冬季漫漫的长夜里,奶娘为他唱民间歌谣,讲各种民间故事,借以消磨时光。因此,普希金把他的奶娘称呼为“我亲爱的老妈妈”,把她写进诗歌,说她是“苦难岁月

的亲人”。

1824年11月初,普希金在给弟弟列夫的信中写道:“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?午饭前写读书笔记,午饭很晚;饭后骑马外出,晚上听奶娘讲民间故事,弥补我所受可恶教育的缺陷。这些故事太美了!每篇都是一部长诗!”

1825年普希金在《冬天的傍晚》这首诗里,写他请求奶娘为他唱歌:

喝杯酒吧,我的奶娘,  
我青春坎坷有你陪伴;  
杯在哪里?借酒浇愁,  
心情快乐忘却烦恼。  
唱支歌吧,你唱山雀  
怎样在海边静静地飞,  
为我唱吧,你唱少女  
怎样在凌晨出过门没水。

1826年普希金解除囚禁,回到莫斯科,写了《给奶娘》这首诗,怀念亲人:

我年轻苍苍的老妈妈,  
你伴我度过严酷岁月!  
你独自在那松林深处,  
很久、很久等待着我。

普希金记录了奶娘讲的七个民间故事情节,依据这些笔记稍后创作了七部童话:《青青的橡树长在海湾》《神甫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》《国王萨尔特坦的故事》《安眠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》《金公鸡的故事》《母熊的故事》和《新郎信》。

只有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借鉴了德国格林童话的情节,但普希金做了适当的修改,德语原作中贪婪的老太婆最后想当“罗马教皇”,普希金改成了“海上的女霸王”,这样更容易得到俄罗斯读者的理解与接受。

为什么世世代代的家长和孩子们喜欢普希金童话呢?我想原因有三。

一、这些童话充满了民间智慧,阅读这些童话作品,有助于小读者明辨是非,区分善恶。让孩子们从小就知晓:善良、忠诚、正直、勤劳,是好人的品德修养;而专横、贪婪、嫉妒、狡诈,则是罪恶的根源。

二、这些童话情节曲折,人物性格鲜明,变化神奇,让孩子们听了既感到惊喜,又印象深刻,记忆长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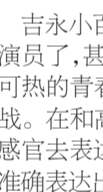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这些源于民间的故事,语言朴实、生动、简洁、优美,节奏鲜明,朗朗上口。因此历久弥新,成了儿童文学著作的经典。

普希金童话不仅在俄罗斯盛传不衰,还拥有几十种外语版本,在世界各国流传。我们阅读普希金童话,不仅要感谢诗人普希金,也应该感谢他的奶娘阿琳娜·罗吉昂诺夫娜这位善良可爱的老妈妈。

阿琳娜·罗吉昂诺夫娜活到70岁,1828年病逝。普希金终生怀念这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老妈妈。在诗人的内心深处,他所写的每篇童话,都是对他奶娘的深切怀念。

## 《北方的金丝雀》： 二十年后的双向救赎

陈扁舟 刘燕凌



从18岁的伊豆舞女到海峡彼岸等待了25年的多惠姑娘,再到73岁出演樱花树下守护亲情的母亲,如今78岁的她依然活跃在影坛上——这就是日本影坛的“常青树”吉永小百合。在中国,她也拥有很多影迷,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她曾多次随日本电影代表团访华,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译制厂走访交流,还和栗原小卷一起爬过长城。2021年,她主演的电影《生命的停车场》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亮相,获得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提名。

吉永小百合出演伊豆舞女时虽然只有18岁,却已经是一位拥有30多部作品的演员了,甚至一年之内就参演了16部电影,一跃成为日本上世纪60年代炙手可热的青春偶像之一。但她的演艺生涯也随着邀约的不断增多,迎来了重重挑战。在和高仓健合作的影片《海峡》的拍摄中,吉永小百合试图调动自己所有的感官去表达女主角多惠,在25年里对男主角阿久津怀有的深深爱意。在镜头前准确表达出隐而不露的复杂情感,吉永小百合奉献了经典演出。

吉永小百合在43岁的时候拍摄了自己的第100部电影,曾四次获得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女主角的殊荣,至今无人打破这项纪录。本周推介的这部佳作,更是她演艺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,即日本东映电影制片厂60周年纪念作品,2012年上映的《北方的金丝雀》。

尽管在日本各地都留下过自己的身影,但吉永小百合对《北方的金丝雀》的拍摄地北海道却尤为钟情。在日本当代影坛,以北海道为背景而拍摄的三部影片《北之零年》《北方的金丝雀》《北之樱守》,被称为“北之三部曲”。在这三部曲中,《北方的金丝雀》更是夺人眼球,除了群星云集之外,其最大的特点是改编自日本知名悬疑小说家,也就是《告白》的作者凑佳苗的悬疑小说《往世书简》。

20年前,和善可亲的川岛春与丈夫夫夫来到位于北海道的一个寒冷的小岛。春成为当地小学仅有的六名学生的老师,并发掘了他们的歌唱才华。然而一场意外夺去丈夫的生命,之后受到村民指摘的春黯然离开小岛。时间回到当下,刚刚退休不久的春迎来两位刑警的造访,进而得知当年六名少年中的一人卷入一起杀人事件。心中怀着种种疑问,春返回阔别已久的小岛,并先后走访其他5名学生,当年的事件在他们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,而此次重逢能否打开师生各自的心结?吉永小百合饰演川岛春,满岛光、宫崎葵、松田龙平等多位日本影坛知名的中生代演员参与演出,他们将在这片碰撞出怎样的火花?一起走进《北方的金丝雀》,看吉永小百合如何用歌声融化沉寂20年的冰霜。

6月3日 21:58 CCTV—6 电影频道与您相约《北方的金丝雀》,6月4日 15:17“佳片有约”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。

## 满庭芳

第五一五期

从海河上的金汤桥往东走去,一幢坐南朝北、西式古典且带有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矗立在眼前。门口两根圆形柱式直通二楼,外沿用水刷石砌成,简洁明快。跨入大门,是一个拥有中厅和侧廊的剧场。这儿便是东天仙戏园旧址。2020年,东天仙戏园旧址被列入第五批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名单。

东天仙戏园始建于清光绪十六年(1890),位于今河北区建国道121号。开始只是有人在此处搭建一个席棚子,招来一部分艺人演戏。宣统元年(1909)这里出现了一个名叫东天仙的砖木结构的旧式戏园。据说津门早期戏园喜用“天仙”为名,如上天仙、下天仙、中天仙等,而东天仙戏园由于地点方位的原因,约定俗成命名为“东天仙”。初建时为砖木结构,整体分两层,可容纳一千余名观众,是当时天津最大的戏园。

旧时在天津,“东天仙”绝对是个叫得响的地方。尤其是光绪二十八年(1902),意、奥租界设立,东天仙戏园被圈入奥租界,奥租界当局在戏园门前修了金汤大马路(今建国道),使其地理优势愈加凸显出来。民国时期编印的《天津地理买卖杂志》里说:“大奥国,衙门空,烟草公司菜市场;奥租界,东天仙,机器磨坊极壮观。”可见“东天仙”竟成为奥租界的显著标志之一。“东天仙”一度取名“天宝戏院”,故而“老天津”亦称其为“天宝”。戏园首任后台总管张春荣对演员们要求:“即使赶上风雨天气台下只有一位观众,也要原戏、原角,演好、绝不回戏。”这样的经营方式,为当时的戏园赢得了极好的口碑。

谭鑫培、刘鸿升、尚和玉、李吉瑞、张黑、梅兰芳、金月梅等老一辈戏曲演员、艺术家都曾在这里演出过。著名女伶金月梅,1910年曾排演过《节义传奇》和《义记》两出新戏,后者首演就是在“东天仙”;民初梅兰芳新排的《一缕麻》,是他来津时在这里首演的。这两出戏给“老天津”留下深刻印象。《一缕麻》是梅兰芳的新编时装戏,作品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,在艺术形式上也有很大创新,一时间轰动津门。从中也难看出“东天仙”的影响力之大。

因年久失修,“东天仙”于1931年8月间动工重新拆盖。重建后的“东天仙”为砖木结构二层,局部三层,正面有仿伊奥尼亚立柱,改称“东方大戏院”,1937年改名“天宝戏院”。主其事者,经营手法灵活,除上演京戏、梆子外,也演评戏、话剧和曲艺,轮流更换,以招徕观众。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,天津的娱乐场所所以法租界劝业场附近最火,而当时李少春、李万春、金少山等都在“东天仙”演出,也曾轰动一时。相声艺人侯宝林组织北艺剧社,在此演出过富有喜剧意味的《梁上君子》《情天血泪》等舞台喜剧,令观众耳目一新。

“东天仙”一度以演评戏为主,刘翠霞、芙蓉花、李小霞等评剧艺人都曾在此演出。老一辈评剧艺人孙芸竹(艺名“六岁红”)回忆说:“解放前夕,在天津评剧界一些前辈和姊妹们的帮助下,我首演于天宝戏院。三天打炮来了个开门红,可同时也惹出了麻烦。人称‘曲九爷’的戏霸,要我做‘干女儿’。我的养母出面跟‘曲九爷’说:‘我们是逃荒的,到天津暂时混碗饭吃,攒点盘缠就要走,有负九爷抬爱。’好说歹说,还是被赶出天宝戏院,不准我在天津这个码头唱戏。”

1953年7月,天津市河北梆子剧团成立,银达子(王庆林)、韩俊卿、金宝环、宝珠等著名梆子演员,在民主剧场以《喜荣归》《三娘教子》和《秦香莲》献演于观众,极尽一时之盛。当初,该剧团的舞台坐南朝北,台顶为木结构,顶中心装有花纹孔雕直通顶棚外,孔雕旁镶有“三上神仙”四个大字。共两层楼,楼上为两级包厢,一级25个,二级30个,每个包厢可容8至10人。楼下散座均为条凳。楼下三面廊子坐席,东、西面为男座,正面为女座。现今剧院内外大体保持原貌,但包厢、条凳等早已不复存在。

想当年,我也是这家戏园的常客。我上小学时就痴迷于戏剧,我家距“天宝”不远,上世纪50年代,我常约几个同学到“天宝”看戏,记得那时楼上最前面是一个个包厢。一天晚上,我和几个同学在一个包厢里观看京剧《三岔口》,大家都很开心。《三岔口》是个武戏,散戏后,几个人在回家的路上还在模仿武打的动作。后来“天宝”改为“民主剧场”,我常去那里看电影,现在还保留有“民主剧场”的电影票。70年代以后我当上河北区的干部,区委、区政府的一些重要会议多在这里召开。再后来这里又改作舞厅、娱乐厅,成为舞迷们的乐园。

“东天仙”数次更名,功能也在变换,但其建筑形式和基本格局并无多大改变,其作为历史建筑的文化价值不言而喻。2021年5月,天津首家“德云社”选址于此并开业,给这座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古建筑注入了新活力,也让天津这个曲艺之乡焕发出新的光彩。(图片由《小楼春秋》摄制组提供)

## 《小楼春秋》解说词：

天仙茶园是一个规模不是很大,比较简陋的演出场所,在天津几家名为“天仙”的茶园中,因为地处东部,而被称为“东天仙”。规矩严格的班主管理制度,吸引了众多京戏、梆子名角前来演出。“东天仙”的新鲜花样层出不穷,邀请当时天津的京戏名角李吉瑞(右图)、梆子名角魏连升(左图),组成吉升戏班,他们打破了女演员不许登台的传统,带出了一批女名角。“东天仙”逐渐成为天津最有影响力的戏园。

20世纪20年代后期,受租界相继崛起的新戏院影响,“东天仙”生意渐趋冷落。1953年5月改为国营,定名为“民主剧场”。2021年,剧场再次迎来修整,恢复成东天仙戏园时的模样。(节选)



李吉瑞(右图)、魏连升(左图)组成吉升戏班,他们打破了女演员不许登台的传统,带出了一批女名角。“东天仙”逐渐成为天津最有影响力的戏园。

而华资制革厂资本额少、设备简陋、营业受时局影响非常大,特别是制革行业所需流动资金数额较大,生产周期较长,华资制革业更加举步维艰。例如,1935年天津制革厂中,只有4家工厂拥有技术员;1936年时天津制革厂有60家左右,但至该年秋冬季节,停工者就有三分之一,原因是东北失守后市场损失大半,加之此前世界皮价下跌,也是雪上加霜。此外,由于部分皮革产品(例如鞋面皮等)中国不能自主生产,每年还须大量进口皮革。即便如此,华北制革厂仍日凭借其雄厚实力,在全国民族资本制革厂中占据前列。七七事变后,受战事和日方统制政策等影响,华北制革厂损失惨重。日本的洋行、公大制革株式会社、神荣公司等机构,先后对华北制革厂进行威逼利诱,试图强行购买其厂房和机器设备,强购不成改为加入股本,企图将华北制革厂变成中日合办工厂,被拒绝后又提出租用的要求。所幸华北制革厂的领导人员均是爱国人士,日本人的企图没有得逞。此后,华北制革厂被迫将机器设备拆下隐藏,避免被敌人利用,又将厂房租给德商洋行,只留下一小部分机器维持生产。

天津沦陷初期,日伪当局对生皮控制不太严格,天津的华商制革厂尚能从本地、河北、山东、河南等地购入原料,维持生产。1939年日本人成立华北皮革协会(后改为皮革加工统制协会)后,80%的生皮归日本军用,剩下的20%为协会垄断,各厂须入股才能分配到生皮。时任天津制革公会会长的王晋生带头抵制,只认一股,其他会员效仿,方才勉强维持开工,但所产鞋底皮等因战事无法运输,只能在平津两地出售。1941年后,皮革被日伪当局列入军用物资进行统制,对各制革厂实行原料定额配给,直接造成各工厂生产时停时开。华北制革厂得到的原料配给极少,每日只能得到三四套零件的“配给”(每套零件为牛头、牛尾各1个,牛足4只),被逼无奈,华北制革厂只能变卖、出租厂房设备,靠织牛毛毡里或布线袜子勉强生存。1943年9月,为了实现华北皮毛一元化统制,日伪当局成立华北皮毛统制协会,并出台《毛革类搜集促进要纲》等文件,对皮毛的收购和配给实行更加严格的统制,由华北皮毛统制协会统一收购市面毛皮,不允许各工厂自由加工皮毛。在此情形下,多数皮革厂被迫停工,改从其他业。

华北制革厂作为华北制革业翘楚,其发展历程及其创办人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和爱国精神,是近代天津工业的一个缩影,亦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天津民族制造业史话(七)



## 华北制革厂的兴与衰

刘风华

鞣制法,先行浸泡皮张2至3日柔软后,放入灰池5至6日,待毛自动脱落时去毛洗灰,洗净后放置在单宁桶中,加入树皮树脂或其他“物质”,洗净晾干再施以油脂,放入轧皮机倾轧、铲板、染色、磨光后即可完工。华北制革厂主要以牛皮作主要原料,牛皮大多产自河南、山东、河北三省;次要原料中,除了石灰、食盐、芒硝等几种可国产外,其他均为进口,例如硫酸来自德国,纯碱来自英国,各类树皮、树皮油、树皮膏来自美国、英国和印度等海外。

华北制革厂最盛时期,拥有色箱(丹宁槽)200多个,洋灰池20多个,转鼓20个,轧皮机8架,其他如挤水机、冲皮机、片口机、压力机等一应俱全。该厂在创设时曾生产多种皮革,市场反应平淡,王晋生再次赴美学习技术,回国后采购大型机

器,专产法兰(珐琅或法蓝)底皮、花旗皮、两色皮,以“象”为商标,用于鞋底制作,品质上乘,经济耐用,世人称赞“华北各工厂以华北制革厂之花旗皮、法蓝皮为最优良”,年产花旗皮5000余张,法兰皮1000余张,最高时年产总计2万张以上。在包装上,以10余张皮作为一捆,外面用麻袋包,重量约100磅左右,以磅计价,产品除供应天津各皮件厂外,还销往济南、北平、锦州、沧州、包头、张家口、大同、开封等地。此外,1927年华北皮革厂还添置了皮带设备,生产“双象”“象”“马”“熊”等品牌的传带皮带。

同当时上海、广州等地的制革业一样,外资制革厂资本雄厚、技术设备先进,原料获得容易且较为廉价,因此,各地制革业中的头部企业基本为外资工厂。